

#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

宋士云

(聊城大学商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希克斯是当代西方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写作《经济史理论》时, 视野很开阔, 尽管该书是立足于欧洲的, 但也时常涉及亚洲、非洲以及美洲的问题。在该书中, 他谈到和论述中国问题的地方就多达十余处。就这些论述而言, 有些是很到位的, 有些论述是不确切的, 甚至是错误的。究其论述不清和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他不太了解中国国情, 在于他的历史分析不是更多地借助于历史事实的进程而是借助于他本人并未解释清楚的理论结论所致。

**〔关键词〕**希克斯; 经济史理论; 中国问题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6)03-0029-04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 (JOHN R. HICKS) (1904—1989), 英国人, 当代西方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一生著述很多, 研究领域十分广泛。1969年, 他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经济史理论的著作, 即《经济史理论》。在写作《经济史理论》时, 他视野很开阔, 尽管是立足于欧洲, 但也时常涉及亚洲、非洲以及美洲的问题。在该书中, 他谈到和论述中国问题的地方就多达十余处。这些论述有些是很到位的, 有些论述是不确切的, 甚至是错误的。究其论述不清和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他不太了解中国国情, 在于他的历史分析不是更多地借助于历史事实的进程而是借助于他本人并未解释清楚的理论结论所致。为更好地解读《经济史理论》这一世界学术名著, 为使初读者在对这个问题上不至受名家观点所左右而人云亦云, 笔者在此文中拟对希克斯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稍加评析, 以就教于有关专家和同仁。

一、希克斯认为中国元朝成吉思汗时期是一种非市场经济模式, 一种从习俗经济到指令经济的过渡形式

在《习俗和指令》一章中, 希克斯曾对最早的非市场经济模型, 即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的特点与存在的社会条件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说, 在习俗经济中, “人们的许多古老方式不太受外来压力的干扰。他们的经济可以运行, 因每一个成员都在完成指定给他的任务, 包括由他在指定的范围内做出决定; 几乎从来不必从‘中心’做出凌驾一切的决

定。一旦这种系统达到了均衡状态, 它就能长期持续、无需改组——无需做出组织方面的新决定。”(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14页。以下该书的所有引文仅注页码)但是, 当习俗经济遇到一些新的紧急情况, 需要对其改组, 或者说“当习俗经济被彻底扰乱时, 它便直接过渡到军事专制主义”(第15页), 即转变为指令经济。“班图人村社推举出查卡, 蒙古游牧部落产生了成吉思汗。”(第15—16页)希克斯在这里道出了成吉思汗时期中国社会习俗经济的脆弱性和从习俗经济到指令经济转变的紧急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这种表述很有道理, 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然而, “专制君主未必能把各种习俗破坏殆尽, 专制君主有机可趁的危机局势一旦过去, 习俗便会悄然恢复。除了在危机情况下, 一个纯粹的或几乎纯粹的指令经济是很难存在的”(第16页)。希克斯说, 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都是纯粹的形式, 极端的形式, 常见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 即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混合类型。“封建制度便是一种混合类型, 习俗在这种形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典型的官僚政治是另一种混合类型, 其中指令成分较强。”(第22页)希克斯的这些论述也很适合于中国的封建社会。

二、希克斯谈及中国的传统的官僚制度, 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在《习俗和指令》一章中, 希克斯还论述了官僚

制度对非市场经济组织形式以及岁入经济的影响。希克斯认为,官僚政治在原则上并不依赖市场制度,但是其潜力却是只有在市场制度逐渐使之增强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用官僚政治的办法解决经济方面的封建主义和保证中央税收的问题,虽不失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但这较之用封建制度的办法是更困难,也更复杂的。

在论及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时,希克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成功的官僚政治的另一个显著例子是中国的传统的官僚制度。它至少可以追溯到汉王朝时代;它一直持续着,直到不到一百年以前才告结束并在继起的制度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人对官僚政治的原则有着充分的理解,他们创制的原则比埃及人创制的要清晰得多。最著名的是中国人通过科举考试补充官员的制度。这种成功的官僚政治确乎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一种非常稳定的均衡状态。它经受得住猛烈的冲击(如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并在强大的冲击之后仍能复原。”(第20—21页)这就是说,官僚制度能弥补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的不足,它有强大生命力。就是这样的一种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被西方人所借鉴,进而演化成当今世界颇为流行的公务员制度。

希克斯称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是“典型的”官僚政治的极好范例,像这样成功的典型在别处并不多见。他说:“较为常见的型式是初建之后归于瓦解,或演进成为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可能本身不过是达到瓦解的一个步骤。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堪称是一个独特的范例。”(第21页)他认为即便是莫卧儿帝国经历过如同埃及和中国的那种官僚政治阶段,但在英国人进入之前它就已经衰落了。

三、希克斯认为在西方世界较为普遍存在的交易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路径,在中国统治者那里没有走通

在《市场的兴起》一章中,希克斯论述了交易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从定期集市贸易演进到专业化贸易,这种演进是从乡村的习俗经济开始的;二是从已经完成的专业化进入规模较大的商业,这种演进是从指令成分较强的一种社会形态开始的,他认为交易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路径可能直接在上层出现,这在西方世界是较为普遍的,而在东方的中国却不是如此,他说:“人们记得中国的皇帝是如何(很自然地)把第一个到他宫廷里来的欧洲商人当做贡物进呈者的。”(第29页)笔者认为,中国出现这样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占

主导地位的大国,清乾隆皇帝不是曾向英国国王骄傲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吗?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中国皇帝没有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价值或使用价值的欲望,他把外贸看作是向对方的恩赐而不是发展的相互需要。

希克斯还认为古代君主国家确有一些城市,包括中国的长安和洛阳虽然有市场,但是他们不是或者说基本不是建立在交易经济之上的。这些城市“一向是靠(或主要的靠)成为那些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税收的开支来维持”,“在很大程度上确应首先把他们看作是扩大了的王室家庭,其中住着君王的随从和那些随从的佣仆,以及这些佣仆的佣仆”(第31页)。

四、希克斯对古代中国商业扩张的短暂性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欧洲在商业经济的兴起上优于东方的关键在于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

在《市场的兴起》一章中,希克斯说:“商业经济要想达到繁荣,就必须确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对财产的保护和对合同的保护。对这两方面的保护都不是传统社会所提供的,主要是由商人自己提供的。”而这“除非商人社会中早已建立了某种社会联系或组合,否则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第35页)。希克斯认为重商主义或商业性的组织,或者说商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法律的或至少是准法律的机构和制度来维护。

希克斯认为,在可以利用的比较正规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之时,商业经济如果要获得发展,不仅需要统治者以某种赞同的态度来对待它,还需要统治者及其法官和行政官员对它有“好感”。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意义深远的商业扩张,特别是在明王朝初期(十五世纪)中国在海外贸易方面的重大发展,就是得益于此。但这种商业扩张和海外贸易发展为时不长,或者说昙花一现,其原因在于统治者提供的赞助是不大牢靠的,难以满足发展的要求。同时,这也道出了适应商人需要的法律制度对商业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可以利用的比较正规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之时,欧洲商业经济在第一个阶段上发展的要求是在地中海沿岸的城邦中得到了满足,即城邦为欧洲贸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希克斯说,欧洲历史与亚洲历史迥异的重要关键就在于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由于存在众多的城邦所以欧洲在商业经济的兴起上优于东方。对于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希克斯认为这主要

是地理方面的。他说：“欧洲城邦是地中海的恩赐。在技术条件方面，地中海已卓然成为连接生产力颇不相同的各国的一条公路，另外，它有许许多多孤立的小块地区，冷僻的角落、岛屿、海岬和溪谷，这些在同样的条件下一向是容易防御的。亚洲就没有完全类似这样的条件。与地中海相比，日本的内海小得多了，其周围地区的自然资源也不同于地中海各国。至于中国海，长期以来它就是贸易的障碍，这个障碍望而生畏、难以逾越，结果这可怕的障碍成为日本文化在其历史初期免受中国文化湮没的主要原因。”（第 37 页）这就是说，中国海不仅没有像地中海那样为商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反而实际上成了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障碍。笔者认为，希克斯所作的这种分析不免带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值得商榷。

五、希克斯论述了中国的货币制度，认为中国王朝的更替与货币有关

希克斯认为，“国家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关系历来是非常密切的”（第 59 页），但只有铸币才是这种联系的真正开始。铸币的产生是国家对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实行信用担保的结果，货币（铸币）一经使用，便因其特性而广泛传播，遍布于商业涉及的一切领域。“货币应用是希腊城邦制度留下的最早的经济遗产；也是奉行商业经济的‘中间阶段’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第 63 页）。关于中国的货币制度和货币职能，希克斯写道：“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制度是唯一有别于希腊祖先的这一惯例的重大例外。中国的货币制度是在同样漫长的时期中发展起来（真不可思议），但其特征明显不同，完全独树一帜。它似乎从一开始显然就不建立在贵金属的基础上，从而很可能没有经过以‘价值贮藏’功能为主的阶段。中国的货币直接过渡成为支付手段，因而中国人比西方人较多地接受纸币，中国人最早采用纸币并不仅仅因为中国人最早发明了印刷术。”（第 63 页）对于希克斯的这段文字，笔者认为既有正确的一面，即指出了中国货币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肯定了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同时它也存在着错误，即割裂了中国货币与贵金属货币之间的关系，进而认为中国货币没有价值贮藏手段的职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从先秦直到清代虽然铜一直是官方肯定的币材，但是金、银与铜通常是并行流通的，而且大都为官方所认定，如宋的银、铜、铁的并行流通。

希克斯认为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具有重要

影响，它经常使得君主由于缺乏货币而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说，这种状况在西方导致了对犹太人和圣殿骑士的财富的野蛮没收，导致了英国的内战和法国的革命；“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有迹象表明，中国王朝的更替至少部分也是由于这同一原因”（第 75 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希克斯认为，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税收长期不足。君主应付他的支出问题简便的办法就是举债。君主举债往往需要抵押，他所使用的资产，或是地产——王室的产业，或是税款包收对将来课税的豁免，或是任命某些官职。而这些办法结果都不好，有许多事例表明它们的应用带来了灾难。他说：“放弃国家财产和放弃征税权力都显然削弱了政府。我们可以在查理大帝国的崩溃和后继的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找出它们的影响。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初期也有过同样的情况。如果它部分地说明了原来的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崩溃这一历史上最大的奥秘，那是不足为怪的。”（第 80—81 页）对于这样的解释，希克斯做了如下补充：“的确，人们可以这样说，这是把罗马史仿佛作为中国史来读了：把罗马的崩溃完全与（几乎同一时期的）汉王朝的崩溃等同起来了。然而，这的确说明了人们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不过差别也是存在的，而且差别可能比相似之处更为重要”（第 80 页）。笔者认为尽管罗马的崩溃与汉王朝的崩溃有相似之处，但是其差异也是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罗马帝国在政体上是共和民主政体，经济上是商业经济已比较发达；而汉王朝在政治上是一种典型的官僚制度，在经济上是一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

六、希克斯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是欧洲商业机会枯竭的产物，指出了工业化给中国城市带来的压力，分析了中国政府推行保护主义的原因

在《工业革命》一章中，希克斯说，工业革命最初出现在商业扩张已达顶点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等，这些国家由于早已存在的活跃的商业网，不断通过发现新的机会来实现扩张，地理大发现曾使他们的商业扩张获得充分的机会。但是到 18 世纪以后，这种机会就渐渐枯竭了。因此，在十九世纪，欧洲为了贸易的继续发展在寻求提供新的出口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说：“非洲和美洲之间的贩奴贸易以及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虽系例外，却十分明显地证明了这一规律。”（第 130 页）对于希克斯将十九世纪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看作是欧洲

商业机会枯竭的产物,笔者不敢苟同,而是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正是欧洲商业扩张的产物,是寻找和提供新的出口品的产物,即欧洲为了推销更多的工业品,同时得到更多的中国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等产品和原料,而在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不得不建立起棉纺织品——鸦片——茶丝的“三角贸易”传动系统。在这“三角贸易”中,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的纺织品,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叶和丝绸。鸦片向中国输入的越多,三角贸易传动系统转动得越快,英国侵略分子的腰包膨胀得就越快。

在《工业革命》一章中,希克斯还分析了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说:“工业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世界性的。”“在英国,无产者被吸收到产业工人阶级中去的过程大体已告完成;在其它大多数‘先进’国家,这一过程也已近于完成。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个过程不仅没有完成,甚至在许多场合似乎连一点进展也没有。”(第142页)希克斯认为,这主要是不发达国家人口太多而经济增长较慢。人口的移动一直是离开土地而不是趋向土地,即趋向于城市,因此,在不发达世界的城市,诸如孟买、加尔各答、雅加达以及广州和上海等城市中存在大量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前产业无产阶级。对于解决城市无产阶级的问题,即失业者的问题。希克斯认为,苏联和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办法。他写道:“一个强大的政府所能做到的大部分事情俄国人都做到了,如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以遏止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将劳动力固着于为他准备的土地上。”而“这种‘解决办法’对中国共产党人则不适用,中国共产党人从其先驱者起便将早已形成的广大城市无产阶级继承过来。”(第143页)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希克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问题的如此的表述,笔者认为不太确切。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之后确实是将早已形成的广大城市无产阶级继承过来,并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的方式消除了失业,但是,同时中国还采取了城乡户籍壁垒的方式,像苏联一样将农村剩余人口固着于土地上,以遏止其向城市转移,以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对于后面这一点,希克斯给以忽略了或者说没有看到,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国情所致。其实,中国和苏联在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时,采取的方法是大同小异的。

七、希克斯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商业经济尚未深入渗透的国家

在《结论》一章中,希克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政府的行政革命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了。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说:“政府在战争期间发现竟有那么多权力、经济权利、对自己人民的权利,落入了它们的手里。战争过后有些政府极力想把这事忘掉;可是又不得不使权力一点一点恢复过来作为它们应付其政治和经济方面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紧急事件的最简便易行的手段。至于像俄国和后来的中国这样一些在商业经济并未深入渗透的国家当权的态度鲜明的革命政府,则急切抓住了权力送给它们的机会。它们对权力采取何种立场由其奉行的学说决定,但将其学说付诸实施的能力则决定于在别处发生过的那种行政革命。它们正是通过行政革命才能使其传统的官僚主义以现代形式重现于世。”(第147页)这就是说,行政革命与政府干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前者促成了后者的实现。这在商业经济发达国家确实是如此,而在不发达国家中如中国就未必是这样。行政革命虽然在中国政府干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通过革命,即夺取政权的革命来实现的。行政革命与夺取政权的革命是两回事,不可混淆。

最后,谈谈对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问题论述与思想的批判借鉴问题。笔者认为,虽然国外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思想深刻、见解睿智、学术造诣较高,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的著作,可以使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和理解能够进一步加深,从而为学习和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提供帮助,但是,这些著作由于受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所使用分析方法的局限,错误和疏漏以及论述不太清楚在所难免,特别是当他们的著作涉及到他不太熟悉的国度或地区以及研究领域时就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学习国外经济学名著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和原则,实事求是,善于分析,善于鉴别,既不要因其有一些错误而大加批判进而全盘否定,也不能因其是名家而不加鉴别地全盘吸收。一句话,对待国外的经济学名著,包括对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我们要善于和学会批判地吸收与借鉴。

作者简介:宋士云(1966—),男,山东阳谷人,经济学博士,聊城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段晓光